

邪教在我们 中间

美 玛格丽特·泰勒·辛格 著

刘宇红 黄一九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邪教在我们中间

〔美〕玛格丽特·泰勒·辛格 著
刘宇红 黄一九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邪教在我们中间/(美)泰勒(Thaler, M.)著;刘宇红,黄一九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7
ISBN 7-5438-2273-3

I.邪… II.①泰…②刘…③黄… III.邪教-研究
IV.D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876 号

7

责任编辑:聂双武
曹伟民
装帧设计:贺旭

邪教在我们中间

[美]玛格丽特·泰勒·辛格 著

刘宇红 黄一九 译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45,000 印数:1-3,000

ISBN7-5438-2273-3

I·297 定价:17.50 元

译 序

“邪教”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词，《辞海》（1978年版）和《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版）都没有收录。遍查古代典籍，也只有《南史·袁君正传》中才有“性不信巫邪”之句。“巫邪”之说，稍一推敲，似与“邪教”尚有出入；至于“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中的“怪力乱神”，实指四类荒诞的自然或心理现象，与“邪教”也略嫌牵强。然而，历史进入20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法轮大法研究会”被定性为邪教组织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揭批邪教的高潮，邪教之为何物已家喻户晓，邪教祸国殃民的本质也早已妇孺皆知。但尽管如此，国内外支持、同情法轮功的仍大有人在，所以，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邪教及其危害，意义十分重大。

本书共分为3部分，12章。第一部分，即前四章，深入论述了邪教的特征、类型、参加者的动机与入教前的身心背景，以及邪教的发展历史、人们身陷邪教的心理历程和邪教的危害等。第二部分，从第五章到第九章，探讨了邪教招募信徒的过程、各种劝说技巧以及招募者如何侵入到人们的工作场所对人们进行挑唆、离间以达到吸收信徒、扩大组织的目的。这部分还着重揭露了邪教威胁、恫吓救治信徒的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医生以及披露邪教内情的新闻媒体的罪恶伎

俩。第三部分，包括第十、十一、十二章，反映了邪教信徒如何才能逃离虎口、重返主流社会的全过程。作者秉着无比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惜冒被邪教组织威胁、报复的危险，设身处地为邪教信徒着想，并身体力行全力营救、医治邪教信徒，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

二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读懂本书关于邪教的论述，我们还是把本书对邪教的论述与法轮功做一粗略对比，这样也许既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的理解，也能使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法轮功就是邪教”的论断。

·邪教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所有邪教都有一位体现神的意志的教主，他（她）越来越成为信徒们崇拜的偶像，有的教主还称能使信徒脱离凡胎，入圣成仙。第二，具有可与本书详细描写过的被称作“强迫说服教育”或“思想改造”的方法相提并论的心理变化过程。第三，存在来自上层（即领袖或统治集团）的管理和操纵以及来自下层（即崇拜者和成员）的顶礼膜拜。（见本书《前言》）

·李洪志自命教主，大搞教主崇拜。为了使弟子得到“圆满”，李洪志危言耸听，强迫信徒接受他的价值理念和是非标准。

·邪教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让信徒接受一种精心设计的思想改造或群体说服，旨在改变其人生态度，实现教主对信徒及其生活的高度控制。第二类向信徒兜售意识形态培训方案，以赚取商业利益。（见第一章）

·法轮功应归入第二类。但也有类似“思想改造”或洗脑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李洪志东拼西凑的“经书”（如《转

法轮》)和挑唆煽动信徒闹事的“经文”实现的。

·邪教有两大目的：吸收新成员和聚敛钱财。而吸收新成员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聚敛更多的钱财。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想来就得掏腰包”，就得买教主的“教程”。作者以邪教信徒屈西娅为例（见第二章），说到许多信徒举债入教，结果人财两空。在第九章中，邪教信徒巴巴拉成了教主勒索其家人的人质，教主动辄向她母亲索要“一些圣诞甜饼和一张支票”。

·法轮功打着“普度众生”的旗帜，希望普天下的“众生”，包括连衣食都没有保障的下岗工人，都成为他的弟子，买他的“经书”、“法像”和磁带，非如此就不能长功，就不能“圆满”。李洪志给人“治病”时常把“功德箱”置于显眼的位置；而对于个别信徒提出向遭受水灾的地区捐助钱物时，李洪志竟斥之为“常人的心态”、“常人的做法”，是心性不高的表现。

·邪教草菅人命，强迫教徒集体自杀。如琼斯顿自杀案、华科悲剧等（见第十章）。血淋淋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教主们在榨干了教徒的油水后吃人不吐骨头的罪恶本性。

·李洪志同样视追随者的性命如草芥，为了向政府施压，他主张“流点血才好”，流了血政府才会让步。据统计，法轮功学员自杀和把亲人当“魔”杀死的竟超过 1400 人。

·邪教疯狂栽赃，陷害敢于揭露他们所作所为的新闻媒体和其他有正义感的人士。在第九章中，一名信徒扮成教授的助手，篡改学生的论文，在论文上乱加批语，离间师生关系，让政府怀疑教授存在不轨行为。西奈农邪教动不动将媒体告上法庭，开展所谓的“神圣战争”。光是 1978 年和 1979 年，西奈农邪教就对不同传媒进行了 960 次威胁和诽谤。作者在书中写道：“从大学教授、学生到记者、通讯员

以及作家，那些研究邪教的人经常面临来自邪教世界的侵扰。”

·法轮功对敢于批评他们的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同样疯狂报复，且无所不用其极。据报导，300 人以上的聚众闹事就多达 78 次，如围攻天津教育学院、北京电视台等。其中最为恶劣的是聚众中南海新华门，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教主大多是自大、偏执而又无知的变态狂，如邪教头子蒂姆自称是“比耶稣更大悟大彻的人”，“创造了终极的心理治疗法”，“融汇了弗洛伊德学说、禅宗和瑜伽的精髓”（见第七章）。还有许多教主神化他们的个人经历，声称他们“追随最伟大的领袖——弗洛伊德、卡尔·马克思、马丁·路德·金还有耶稣”（见第三章）。

·李洪志不懂科学（甚至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却又藐视科学、诋毁科学家。为了与释道两家攀上亲缘关系，他竟将自己的生日改成民间传说中佛祖的诞辰日，但又贬低释道两家，称真、善、忍比如来、老子的境界还高，说道家只修了“真”，佛家只看重“善”，所以“在国内外，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目前只有我（李洪志自指）一个人在做”，他认为“末法时期庙里的和尚都很难自度，何况度人”，所以“我（指李洪志）要是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

·邪教“或诋毁或公然禁止或根本没有人身保健，包括儿童医疗保健”（第十章）。

·李洪志同样禁止追随者求医问药，认为人患病是在消业，是因果报应，不消业就不能圆满。滑稽的是他自己患了病却上医院，做手术（李洪志曾因患阑尾炎接受手术）。见人危难而不生怜悯之情，害人夺命反称其功德圆满！

·用鬼怪邪魔吓唬、恐吓信徒是邪教的惯用伎俩。本书第十二章记述了某教主为了惩罚信徒，就会把他说成鬼怪缠身，说“我看见了你身旁的魔鬼”，以此使得信徒诚惶诚恐，乖乖地俯首听命。

·李洪志使用了同样的伎俩，称一旦追随了他，附在信徒身上的邪灵（如鸽、蛇等的鬼魂）就会吓跑，不然邪灵就会寄生在他们身上，夺取其精气，到晚年就会“变成植物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信徒自称是佛，把阻止他们“修炼”的人视为“魔”，并挥锄、举刀奋力除魔，酿造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

.....

我们是俗世中的凡胎，没有天眼，也没有慧眼，但是要识破邪教，识别陷阱，其实也并不难。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我们只要看看教主们是否使用了“催眠、诱导意象和间接的暗示”，是否“借助言辞、行为和环境来减弱信徒有所取舍、瞻前顾后、权衡利弊的思维能力”，是否使用“赤裸裸的骗术来迷惑追随者，给自己一道具有超人神通的光环”，或者是否使用“篡改个人历史的方法、情感控制的方法和同伴压力的方法来使信徒在行为和态度方面发生转变”（见第七章），就能判别某一组织是否具有邪教性质。有了这几个标准，我们就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了。

本书第四章还以列表（表 4.1）的方法详细对比、论证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虽然官兵之间存在控制与被控制、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却不是邪教组织的原因所在，读者可以从这一对比中举一反三，增强防范与自我保护意识。

三

邪教为什么会产生？

本书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邪教产生的背景。作者认为，“当社会不正常、政治混乱或现有社会结构和制度被颠覆时，邪教就兴盛起来了。”而与此相反，“在社会安定团结时，各种救世主只能吸引有限的追随者。”（见第二章）

这种解释很值得我们深思。不管是欧美的洋邪教，还是中国的法轮功，其出现与传播肯定不是偶然的，必定有适合它们萌芽、生长与蔓延的社会气候与土壤。在深入批判法轮功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好好总结一下法轮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为什么能吸引数百万的信徒，这其中还不乏教授、专家、博士甚至博士生导师。政府无用论、人类末世论固然荒谬透顶，但李洪志为什么敢于公然提出这种主张？为什么一经提出就能博得那么多人的认同与支持并不顾一切地去追随它、信仰它？看来，对法轮功现象的研究和批判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等多角度、多层面去进行。而且，值得我们深思的还不仅这些。假如法轮功不去围攻电视台、不去冲击中南海，相反，它还热衷于公益事业，那么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将它铲除？

人类社会从蒸汽机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又从电气时代发展到后工业时代或称信息时代，物质文明的发展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但是伴随物质文明而来的精神空虚、信仰危机以及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尔虞我诈、人人自危的社会现实在一定范围内呈扩大之势。学界同仁对这种社会现实的解释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这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之中，必然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法轮功举着“真善忍”的大旗，打着气功的幌子，主张救世、度人，于是一大群一大群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人，终于住进了法轮功这家黑店。而其最终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说到世人的精神空虚、无所适从时，有人总喜欢称之为“世纪末情绪”。“世纪末”是一个时间概念，用一个时间概念来概括、指称一种社会心态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这种心态只属于这个特定的时间段，世易时移，情况必然改观。果真如此，笔者倒要大舒一口长气，因为在笔者译完本书的时候，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好几天了，但几天来我内心的忧患与不安却丝毫没能减轻。难道如果法轮功在世纪末没有暴露其真面目，在新世纪、新千年的钟声中它就会自动瓦解、不再危害世人了？我只相信，精神家园的再造才是惟一的出路。笔者一介书生，心存忧患却无力回天，唯以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之句才能表达我内心的焦虑与企盼。

法轮功已经被铲除，“世纪末”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决不会加入邪教，就如同士兵相信子弹只会打中别人一样”（第一章），但到头来还是鬼使神差地加入了。所以，面对撒满鲜花的陷阱，我们不要轻易踏上去。

本书作者在劝诫世人谨防邪教之害时把邪教比作一列火车，“在每一个小站，叫卖的小贩、吹风笛的老艺人和自称是救世主的人跳下火车，叫卖着各种诱人的物品，想在车站争取更多的人上火车和他们一起向美好的前方进发。”接着，作者大声疾呼：“当一个邪教教主、一个宗教师、一个冥想训练者或任何自称是吹风笛的老艺人说这是一条‘通往完美的坦途’来诱惑你上车时，当心！那可能是世上最后一趟通向地狱的火车正在途中稍事歇息。”（见第十二章）这是智者之言，发自肺腑，感人至深。读者定当谨记深思！

作者在《致谢》中说：“我要向三千多邪教受害者致以我最真心、最诚挚的谢意。正是他们……使我真正了解了邪教以及它带给众人的苦难。”在这里，我也想说一句：是电

视画面上法轮功信徒自杀或残害家人的惨状以及他们活着的亲人面对摄像机镜头时那种捶胸顿足、痛哭失声的无奈激发了我作为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我要努力把这本书尽快译出来，让所有曾经或仍在受法轮功蒙骗的人了解邪教的真实情况，让 1400 多个屈死的冤魂得以在九泉下安息，让本不该发生的悲剧不再重演。这也正是我翻译本书时夜以继日、往往连续几天足不出户的动力源泉。

刘宇红

2000 年 3 月于松涛村

前 言

玛格丽特·泰勒·辛格对邪教的非同寻常的卓见是无人能及的。她兼具高超的专业技能和非凡的个人胆识，几十年来这种罕见的完美结合使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成功。

辛格认识到邪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她知道一厢情愿的说教其效果是相对较小的，系统化的思想改造过程则会产生巨大的作用，而从前者到后者则是一个连续体。她也清楚，不管是否使用暴力，心理控制是问题的关键。同时，她非常明白关于极权组织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不是任何专业学科所能探讨透彻的，它与更为强大的社会、历史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我就研究极权主义这一问题。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研究纳粹医生，绕了整整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这一课题上。极权主义似乎在历史——或者说心理出现错位时出现。在这一时期，指引人类生活的象征和结构体系解体了，而使这种混乱变本加厉的是大众媒体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使我们中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了解到，我们同时代或整个人类历史中文化进程的任一时刻中从某地产生的任何意象和想法。另外还有一种强大的势力也在推波助澜，即人类认识到自身作为一个物种将会被 20 世纪后期的技术发展所摧毁。这种局面不是人类所希望的也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正逐渐失去心理依靠这一感觉在蔓延，这正是这些社会压力所产生的后果。我们感到自己被不可驾驭的

时代潮流和激进的社会变化所打败。

这一混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全世界范围的由原教旨主义产生的当代“流行病”。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运动起源于害怕失去“根本”的恐惧，这又产生了对绝对教条和神圣自我的渴望——这些都被视作尽善尽美的其实并不存在的过去而加以圣化。

我们所说的邪教是原教旨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一个人所信奉的邪教当然也是另一个人的信仰——或许也叫政治或商业性的组织。正如辛格警告我们的那样，一个人必须仔细区分并根据每一组织的各自表现来判断。我把邪教定义为具有某些特征的一类组织。首先，所有邪教都有一位体现神的意志的教主，他（她）越来越成为教徒们崇拜的偶像，有的教主还称能使信徒脱离凡胎，入圣成仙。某种普遍存在的精神观念助长了这一神化教主的过程。第二，在邪教中出现了一系列可与本书中所详细描述过的被称作“强迫说服教育”或“思想改造”方法相提并论的心理变化过程。第三，存在来自上层（即领袖和统治集团）的管理和操纵以及来自下层（即崇拜者和成员）的顶礼膜拜。

但是不管是原教旨主义还是邪教，其形成都不是最终的形式。另外还有一种在同一历史条件产生的、更具诱惑力的形式。在我心中希望有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灵活自我，这与我们周围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是一致的。我将它称为多变的自我，是根据变化不定的希腊海神普罗裘斯命名的（多变的即 protean，是普罗裘斯 Proteus 的派生词——译注）。

与原教旨主义和邪教本身相反的多变自我是开放的、多维的。它滋生出许多奇怪的形式，也包括各种幽默和嘲讽，其花样远比狭而论之要多。这种多变性在对道德核心的永恒探寻中也不是毫无阻滞的，但是这样有利于避免专制和极

端，并且永远具有转换和变化的可能。

实际上，我相信这多变性是对我们当前历史形势的一种基本反应。将原教旨主义和邪教的形成理解成应付多变性而产生的反应是最合理的，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些反应可能是非常激烈的。但是，诚如暴力和人类生存研究中心最近所披露的一样，即使是原教旨主义者也易受多变性的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要离开邪教组织或不再信奉原教旨主义。

既然历史也如个体的人一样是向前发展的，那么倒退是绝不可能的。存在于当前世界中的躁动不安多是由于多变性和原教旨主义的斗争引发的。这正如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阿亚多兰·科默尼在说前作家沙曼·拉斯戴时所用的那句隽语所概括的一样。

玛格丽特·泰勒·辛格所著《邪教在我们中间》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对这场斗争的描绘。她为捍卫心灵自由而经历的艰难历程使我获益良多。

罗伯特·杰·李夫顿
约翰·杰·克里基

致 谢

多年以来，许多同事为我出谋划策，让我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真知灼见，这一切在我调查邪教及其活动、帮助前邪教成员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尤其应该感谢的是以下几位朋友的大力帮助：罗伯特·杰·李夫顿、劳拉·奈德、理查德·奥夫西、莫顿·雷塞、大卫·米克·里尔其、爱德加·瑞恩、路易斯·杰里恩·维斯特和里麦·卫恩。

我之所以取得较大的成就，完全应该归功于美国家庭基金会和邪教意识网络的大力帮助。他们不仅热情地为我提供参考资料、查找原始材料、提供文献和复印文章，而且还为那些对这一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人所举办的年会提供赞助。我也要感谢精神再造工程（一个社团组织——译注）的人，感谢他们慷慨地允许我使用他们的图书馆和资料。我还要感谢全世界那些无私地为我提供文档材料的朋友和同行们。

我要向三千多邪教受害者致以我最真心、最诚挚的谢意。正是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痛苦和他们治愈创伤的过程，并使我真正了解了邪教以及它带给众人的苦难。

如果没有机敏、睿智的本书合作者加里亚·拉里奇的鼓励和支持，这本书是无法写成的。自从某日午后我俩在我家餐桌上用电脑键盘敲出此书的总体设想后，我们就像终身朋友般开始了合作。谢谢你，加里亚。

最后，我和加里亚还想感谢乔西·巴斯出版社的编辑阿

兰·瑞斯勒 从一开始，他对本书的出版就非常投入，而且自始至终他都在鞭策和鼓舞我们将事情做得更好。

玛格丽特·泰勒·辛格

内容介绍

我向来对语言感兴趣：语言是怎样在人们的大脑中形成画面的？这些画面又是怎样触动人们的情感，让他们另有所思，另有所感的？人们是怎样运用语言来达到取悦、教育以及影响他人的目的的？我还很小的时候，曾经把我新学到的词句一条条写下来。10岁的时候，我开始留心我那些亲戚们的说话技巧，瞧他们说起往事时那股劲儿！我开始变得好奇起来：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是怎样用语言重现画面，让一切都变得活灵活现起来的呢？

上大学之前，我就已经讲过故事，也研究过谈话技巧了。进了大学，我想学的就是说话人如何运用语言，如何进行推理，然后说得让人信服。所以我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辩论、演讲、即兴演说什么的。在大学我最喜欢的课程是宣传分析和逻辑学，因为从中我学会了如何分析语言，如何推理。

后来我成了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对语言和交际的研究又成了我工作的主要部分。在科罗拉多医科大学的精神病学系任职数年后，我作为一名资深的心理学家来到华盛顿特区，供职于华尔特·里德军事研究院的心理实验室。在那儿我和同事们进行了多项研究工作，其中一项便是研究战俘的心理状态。

在人类历史上，强制性的说服教育总在随时随地发生着。从事过这些研究后，我对此已是相当熟悉了。现代邪教